

导 言

本书的目的 或者更应该说是其抱负与奢望 是使其作为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入门著作。它要论证中国形成的阶段、其相继的经历以及世界各地在历史长河中为充实丰富她而提供的因素、她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她对于历史的贡献^①。至于她今天显示出的面貌 则确实是其悠久历史的产物和结果。同样 人们也不能企望在完全不懂自文艺复兴、中世纪和上古时代以来为其形成作出过贡献的外部一切的情况下而透彻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欧洲国家。一旦与大家一道使中国脱掉她那奇妙的历史幅度的外衣之后，那就会彻底误解中国的真相。

中国的重要地位并不仅限于其居民的数量以及这个具有 10.2 亿人口的国家那尚潜在的势力。它还具有更要广泛得多的意义 同时属于过去和现代的范畴。中国文明曾是人类中很大一部分的启迪影响者，将其文

- ① 我们必须考虑到现在尚缺乏有关中国知识的任何一种和甚至是最初级的教科书，尚且丝毫不必讲那些错误思想和成见了。由此而产生了逐步从事将各种事实纳入到其历史背景中的迫切性，同时也要尽量使其发展中的不同领域联系起来的纽带变得更为清晰易懂 如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中国社会与东亚其他文化以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关系、技术、文化生活等……

字、技术、人生观和世界观、宗教和政治制度赋予了全人类的这一部分。朝鲜、日本、越南等作为中国移民的国家也都属于同一文明圈。但中国影响的辐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这些地区，如在蒙古和阿勒泰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中、在中亚、西藏和整个东南亚。它也触及到了一些更为遥远的地区。直至今今天仍不知曾向它借鉴过许多内容的西方，很不了解自己欠下中国的一切文明债，而西方若无这些借鉴就不可能具有它今天的面貌。

综合概述是相当艰难的，本书只是作一次尝试，因为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明史的全部研究无法与为了理解我们的古典社会、我们欧洲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辛劳相比，后一类著作的数目已经过份庞大而无法使人全部熟悉和利用。当涉及到着手处理延伸于 3500 多年之久的如此丰富多彩的事实时，空缺、缺陷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在这些不利条件之外，应再补充以属于另一个范畴的困难。后天获得的全部基础知识都是既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学习，又来自真正的学习，而这一切手段对于任何希望初步了解东亚国家的人都很缺乏。虽然全人类的 $\frac{1}{3}$ 生活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在今天已经变得渺小的世界上，它事实上已经是我们的近邻了。但我们的文化仍在坚定地坚持“西方特征”。如果着眼于欧洲显得仅仅是欧亚大陆上的一片延伸之地和其历史就如同是欧亚大陆历史上的一个具体案例的观点，那就还要求作出进行想象的艰苦努力。

中国的地域与居民

中国的社会史涉及到了一片非常辽阔的地域，它们又远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从西伯利亚延伸到赤道，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到达欧亚大陆的腹地。这样辽阔的地域在地理背景中具有一种很大的差异性和一种综合性的结构，有关这种地貌的知识对于理解历史

是必不可缺的。但我们于此仅限于重提一下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大陆性整体的群山特征，在西南由于神奇的特大群山和辽阔高原的衬托而更加突出了，它们是由自兴都库什到印度支那半岛和喜马拉雅山麓的起伏地带以圆弧状形成的；辽阔的草原（更确切地说是牧场）被沙漠分隔开了，而沙漠戈壁又覆盖了包括西伯利亚森林和华北耕作区之间的辽阔地带；由大河大江的冲积层形成的肥沃平原（满洲的松花江和辽河盆地、覆盖了 30 万平方公里的华北中央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广州地区的平原、越南的红河盆地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其他冲积层平原……）；从阿穆尔河（Amour，黑龙江）入海口到马来半岛所延伸的漫长海岸线、从日本群岛直到地域更加辽阔的印度尼西亚大岛（菲律宾、婆罗洲、苏拉威西、印度尼西亚和苏门答腊）存在着延绵不断的一大串大大小小的岛屿。气候因素再加上这种多样差异性：受季风反复变化影响的东方和南方地区与亚洲腹地那干燥的大陆性气候相对应。但地域（纬度）的影响也并不算太小。这样一来，中国既是西伯利亚式的严寒和隆冬地区，又是赤道带的潮湿和闷热地区。

居住在世界上这些地区的居民人口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其生活方式、文化和语言而各自有别。语言标准无疑是大家想到引以为据的第一种标准。

东亚语言一览表

“阿勒泰语系”诸语言			东北亚语言	
突厥语族	蒙古语族	通古斯语族	朝鲜语	日语
维吾尔语	蒙古语	满语		

- ① 除了日语之外，本表中罗列的所有语族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台湾）出现了。为提醒起见，我们还将提到印欧语言，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由 1.5 万名塔吉克人（伊朗语族）和 9700 名俄罗斯人所代表。

续 表

“阿勒泰语系”诸语言			东北亚语言	
哈萨克语 乌兹别克语 塔塔尔语 撒拉语 柯尔克孜语 裕固语	达斡尔语	锡伯语 赫哲语 鄂伦春语		

汉藏语系诸语言

藏-缅语族	傣语族	苗-瑶语族	汉语族
藏语方言 缅甸语 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半岛的藏-缅少数民族语言	暹罗语 老挝语 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少数民族傣族的语言	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少数民族的语言	北方方言 吴语 粤语 闽南语 北闽语 客家语 滇语

南亚语言(孟-高棉语)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高棉(柬埔寨)语 占人(越南和柬埔寨、东海岸的少数民族)的语言 孟人(下缅甸)的语言 云南、印度支那半岛和尼科巴群岛的孟-高棉少数民族的语言	马来语 爪哇语 印度尼西亚的其他“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台湾的少数民族语言

东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语属于五种不同的语族，其地域分布相对比较清楚，唯有华南和印度支那半岛除外，那里各种语言的交错混杂现象严重。

——从西伯利亚到汉族语言和文明的居民占大多数的华北，

有大量人口向西域和更远的地区流动，其语言也就与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过去被称为“乌拉尔—阿勒泰”语族联系起来了。

——从语言学角度上来讲，与汉语以及和它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完全不同，朝鲜语和日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语族，虽然它们都与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具有某些相似性。

——汉—藏语系的居民区同时覆盖了喜马拉雅群山区的全部高山和高原，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和中国中原（也就是从阿穆尔河流域和蒙古到缅甸、老挝和越南边境的 21 个省的居民）从操各种语言的人数来看，明显是汉语方言语族在这一片地域辽阔而又千差万别的领土上占据主导地位。

——孟—高棉语族在中国西南出现得很少，在印度支那半岛的代表性却要大得多。

——最后，在更偏南部的地方，马来亚和东南亚的大岛屿是所谓“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使用范围，其地域事实上从马来亚向北一直延伸到台湾岛并向西延伸到马达加斯加。

东亚各不同语族的这种分布保持着对一部非常悠久历史的回忆，它代表着这部历史的终点。如果说人们完全不可能知道非常古老时代的形势如何，那么其发展的基本线条相反却是我们所熟悉的。如果自第一个千年纪初期就产生了以其古、中、近代形式出现的汉语语系的各种语言从黄河流域先向长江流域、后向华南和东南亚发展，以及傣语、藏—缅语和孟—高棉语从长江流域和汉藏走廊向华东与印度支那半岛流动和扩展，那末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也向东南和更远的地区扩展过。最后，印欧语言（龟兹语、焉耆语、于阗语、东伊朗方言）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代都出现在西域的诸绿洲，但它们于我们当代却从那里完全消失了。

汉族人

在东亚形成的这片地理和人文的辽阔领域中，属于汉族语言和文化的人口在今天形成了一个最大的集团。他们的开拓领域延伸于近 1500 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 从西伯利亚 北纬 54° 到帝汶岛 (南纬 10°) 从棉兰老 东经 126°) 到欧亚大陆的腹地 (印度西海岸孟买的子午线 东经 73°)。从其人口 3/4 为华人的城市新加坡到阿穆尔河流域，其间距离就如同从都柏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部边境一样遥远。

中国这些人口的总数于 1986 年已超过 10 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辖范围之外的东亚汉族
人口统计表(1986 年的估计数)^①

台湾	19500000
香港	5600000
澳门	300000
新加坡	1800000
泰国	11000000
马来亚	6400000
印度尼西亚	5100000
越南	1500000
总计	51200000

汉人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他们在形成的中国中原的 21 个省中确实占大多数 (于其中还应该再加上台湾省)，但却不停地向这些

① 为提醒起见，我们应重提一下华人团体在印度、马达加斯加、南部非洲和南北两美洲的存在。

省份之外扩展 从而形成了连成一片的近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其地域几乎与我们欧洲一样辽阔，一直到达苏联边境。本著作中经常参照的这 21 个省份具有介于罗马尼亚和希腊之间地域的面积，其人口的密度于 1975 年尚可以与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相比较。在当代 唯一的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省份江苏省（上海 1957 年计有近 700 万人口 而在 1986 年却有 1200 多万人了 南京有 160 万 江苏超过 50 万人口的城市很多）于 1957 年就在其居民密度上超过了荷兰。

但也存在着一个“域外的中国”，由大部分定居在东南亚各国（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人集团组成。他们在马来亚（在那里形成了其全部人口的 1/3 以上）沙捞越、婆罗洲的西北海岸 和泰国为数很多，在越南、柬埔寨、爪哇和菲律宾的数量也远不是可以忽略的。新加坡、马来亚的檳城和马六甲、越南的堤岸都是华人城市。

具有汉语和汉文化的不同居民人口远没有形成一个清一色的整体 而是以他们的传统、风俗、民族组成和方言而互相区别。由于缺乏可以使我们在欧洲于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之间作出那样明确区分的民族标准，在华人世界中掩饰着一种很大的差异，它是历史的产物，在过去无疑比在今天更为明显，那里的教育和交通的方便程度趋向于模糊或抹煞不同地区的固有特征。不过，研究撰写汉族居民的移民史以及华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居民的民族志可能是一项最庞大的任务，可能从来未被人以系统的方式触及过，在这一方面往往都缺乏文献。

汉人占大多数的中国省份与欧洲国家的面积比较表（平方公里）

中国省份	欧洲国家
四川 ----- 569000	
550800-----	法国
504900-----	西班牙

黑龙江	463600	
	449200	瑞典
云南	436200	
甘肃	366000	
	311700	波兰
	301100	意大利
	243400	罗马尼亚
广东	231400	
广西	220400	
湖南	210500	
河北	202700	
陕西	196750	
湖北	187500	
吉林	187000	
贵州	174000	
河南	167000	
江西	164800	
山西	157100	
山东	153300	
辽宁	151000	
安徽	139900	
	132500	希腊
	127800	捷克斯洛伐克
福建	123100	
	110950	保加利亚
江苏	102200	
浙江	101800	
	93000	匈牙利
	41300	瑞士
台湾	35960	
	30560	比利时

虽然它们具有会使我们联想到一种母语在某个限定地区所采取的形式那样的方言名称，但汉语方言却是由数百万人口所讲的。它们彼此之间具有一些如同在欧洲把同一个语族的语言分别开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某些整体（大家于其内部会遇到一些重要的变化）的差异那样明显的区别。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群体的存在。这就是北方方言群——由 1953 年普查中统计到的 3.87 亿人所讲，共形成三个不同的方言集团。这些方言的相对一致性可以在介于蒙古和长江流域之间所有地区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同时也可以由近代向东北、满洲和西南（云南与贵州）诸省的大量移民所造成的人口混杂来解释。中国南部和东南方言的差异以及它们之中的数种古老特征相反却都证明了这些地区人类群体的相对稳定性，它们也可以通过在那里自上古时代末期以来一直在扩大的汉族移民的连续浪潮来解释。

汉族占大多数的省份和汉族居少数的领土上的居民统计表
(1957年的人口普查和 1986年的估计)

汉族占大多数的省份

省份	1957	1986	省份	1957	1986
四川	72160000	101880000	江西	18610000	34600000
河南	48670000	77130000	云南	19100000	34060000
山东	54030000	76950000	黑龙江	14860000	33110000
广东	37960000	62530000	陕西	18130000	30020000
江苏	45230000	62130000	贵州	16890000	29680000
湖南	36220000	56220000	福建	14650000	27130000
河北	44720000	55480000	山西	15960000	26270000
安徽	33560000	51560000	吉林	12550000	22980000
湖北	30790000	49310000	甘肃	12800000	20410000
浙江	25280000	40300000	青海	——	40700000
辽宁	24090000	36860000			

直辖市

直辖市	1957年	1986年	面积
北京	——	9600000	16800
上海	——	12170000	6200

续 表

直辖市	1957 年	1986 年	面 积
天 津	—	8080000	11300

汉族占少数的领土（自治区）

自治区	1957 年	1986 年	面 积
内蒙古自治区	9200000	20070000	11775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640000	13610000	1646900
西藏自治区	1274000	1990000	12216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50000	4150000	66400

说明：广西虽然是一个汉族占多数的省份，但却被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请注意 广西未出现在本表中。

汉语方言（1953 年的统计，以百万人为单位）

北方方言(四类)	387
吴语(四类)方言	46
粤语方言(五类)	27
湘语和赣语方言	26
客家方言	20
闽南方言	15
闽北方言	7
累 计	528

说明：这些数字既未考虑台湾的汉人（现今有 1300 万人 其大多数操闽南方言）；也未计算东南亚的汉族移民区（1100 万人）他们根据其出身血统而分别操粤语、客家语或闽南方言。

完全如同欧洲的人口一样，中国的人口是无数次人员混杂的产物，而这些混杂又都是由战争、异族入侵、移民渗透、人口迁移、毗邻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所造成的。突厥、蒙古、通古斯、朝鲜、藏—緬、傣、苗和瑶、孟—高棉民族以及有时甚至是来自印度、伊朗和

东南亚交界处等较远地带的民族为汉族人口的形 成作出了贡献。中国北方的民族组成在历史的进程中曾由于发祥于草原地区和北满的操阿勒泰语的民族所提供的新因素而经常更新，中国西部省份的人口组成则由于喜马拉雅群山区山民与青海半定居民的杂婚而不断变化。民族杂婚在中国南方也很严重 在那里进行移民开拓的努力到我们今天共延续了 2000 多年。在整个中国的西南地区（贵州、云南、湖南、四川、广西和广东省）还继续存在着非常多的非汉族种族。

如果说汉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那末属于其他民族的中国公民在 1957 年就已经代表着 4200~4500 万人了。这些民族中的 50 多个受到了官方正式承认并享有一种相对的政治自治权。

因此，我觉得汉族人口远不是如同人们先天推理性地想象的那样形成了一个清一色的整体，相反民族差异性在某些省份中极其复杂。那些操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的民族也继续存在于台湾岛的北部和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非汉族民族（1957 年的普查数字）

名 称	民族—语言族	地 域	人 数
壮	傣	云南、广东	7800000
维吾尔	突厥	新疆、甘肃西部	3900000
彝	藏—缅	云南、贵州、湖南	3260000
藏	藏	西藏、青海、四川	2770000
苗	苗—瑶	西南各省	2680000
满	通古斯	东北、内蒙、北京地区	2430000
蒙古	蒙古	内蒙、东北、甘肃、青海	1640000
布依	傣	云南	1320000
朝鲜	朝鲜	东北	1250000

这些非汉族人口是这样一部历史的最后残余：它以汉族语言和文化人口之持续不断的发展为标志，同时也随着他们的拓疆展土和通过与更遥远文明的接触交流而使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经改造、丰富、多样化的文化取得胜利为标志。民族的混杂、不同居民之间的借鉴、同化现象（汉人采纳了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或中国南方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中国南方诸省的某些民族与汉人再没有任何区别了），导致从一种历史视野的角度上突出了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重要地位。

生活方式和文化

如果说东亚和中国（世界这一部分的所有语族都出现在那里）的语言状态就已经揭示了其居民的复杂性，那末其他因素事实上可以更加突出远东的人文现实。那里的采摘业、狩猎和捕鱼、饲养和农业以不同的发达形式构成了人类的基本活动，因为人类首先必须养活自己。他们又以掠夺、侵袭、抢劫、海盗和商贸活动来补充，这些生活手段与以它们为其基础的文化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生活方式为对历史的任何全面解释都提供了基础。

最重要的是地理因素。正是地理促使形成了某种生活方式并强加给它一些限制。在某种海拔高度之上和某些气候条件之外，小麦就要让位于大麦了，蒙古那辽阔的草原牧场更有利于大规模的饲养业而不是农业，需要大量灌溉的水稻种植业最理想的选择地是温带和热带那些能灌溉的平原。……当然，我们无疑不应受一种地理决定论的支配。能灌溉的稻田通过梯田便可以向丘陵地冲击并以灌溉而扩展到干旱地区。中国北方和蒙古南部既适宜农业，又适宜饲养牛、羊和马。由这种海拔高度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人理解它们的前进、后退及其共存。这种现象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并且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接触和互相借鉴。但

人类社会的这种将它们和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天然界限之外的深刻倾向、地理条件给人类活动造成的这种相对自由性，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基本划分（因而也是对文化和文明类型的一种基本划分）相矛盾。人们可以在东亚形成的这片辽阔无垠的地理范围内辨认出与特有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四大文化群体：

——从事发达的和占优势的农业之定居民文化圈。具有汉族文明的居民和深受他们影响的所有居民均属于这种文化类型。

——从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La taiga*，本指亚寒带针叶林。——译者）到华北农业地区和从满洲到伏尔加河下游盆地的草原与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文化圈。

——喜马拉雅辽阔的群山区及其毗邻地区的那些同时从事养殖业和农业的山地人文化圈。

——热带地区的混合文化圈，这些混合文化把具有不同程度的原始农业形式与狩猎和饲养业结合起来了。这些过去曾非常发达的文化今天正处于消失之中。

为了更为完整起见，我们还需要在这四大文化群体之外再补充西域绿洲定居民和商贾文化群体。

农业发达并占有优势地区的定居民

正如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正是最发达的农业形式可以使人口得到最迅速的增长、组成了丰盈的储备并形成了组织完善的国家。这样一来那些伟大文明便开始了。但在延伸于东亚所有的平原、谷地与肥沃高原之上并使生活在类似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也采用它的生活方式的这一文化圈内，则必须区别出两类不同的农业：

——一种要上溯到新石器时期的旱作农业，其粮食作物是大麦、各种谷类和小麦。在相当于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区中灌溉

以零星的方式实施的，它可以使收成增加和稳定。尽管农业在这些地区占优势，饲养业（牛、羊、马在上古时代，公元前第 2~1 个千年纪）也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并在长时间内保持了一种远不能被忽略的地位。但农业定居民与游牧民和山地人不同，他们厌恶食用奶制品并减少了肉类在他们的食物中所占的比例。

——水浇稻田的耕作，它在公元后最初 10 个世纪期间只得到了缓慢发展，仅仅在该时代之末才得到充分发展。这种农业技术的发源地很可能是多元的（北印度和主要是长江下游盆地），但应该是取得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成功，发展到了可以灌溉的所有温暖和潮湿地区（中国的热带和亚热带平原与谷地、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日本）。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在东亚人口史上代表着一个新阶段，它从公元 8~10 世纪起为世界这部分地区的文化输入了新的生命力。

此外，东亚发达的农业形态丰富多彩。它是以一系列的进步和变化为标志的。除了水稻耕作技术的改进之外，由于选择优良品种、在 13 世纪时引入高粱和从 16 世纪起引入美洲的农作物（甘薯、花生、玉米、烟草、土豆）所以一千多年以来引起了许多根本性变化。

草原地区的游牧民

这些操“古阿勒泰语”和“阿勒泰”语的居民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曾扮演过一种重要角色并对其文明施加过深刻影响。他们的主要特征是：

——住宅（蒙古包）、畜群（黄牛、绵羊、马匹、骆驼、牦牛）和其他财产（妇女的首饰形成了游牧民的动产）的活动性。在平原上的夏牧场之间和避风谷地的冬牧草场（冬窝子）之间的迁徙往往不会超过 150 公里。但牧民部族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做远距离旅行，

们一般只有在更强大部族的威胁下才会这样做。

——一种习惯于日常战争训练 驯马、狩猎、骑射或打枪 的生活方式。

——畜产品足以维持主要需要 奶、马奶子酒、奶酪、酥油、毛织品和毛、皮和皮货、作为燃料的干畜粪 的经济。抢劫 入侵定居居民或毗邻部族、掠夺商队）、定居民的馈赠和商品的交流可以为这种经济提供某些补充，这就是从 10 世纪起的金属、粮食、丝绸、奢侈品和茶叶。抢劫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在冬季获得粮食补足，但也经常是强迫定居民开放市场。然而，游牧民并非完全不懂种植大麦（燕麦）小麦和谷子 他们在某些时代也发展了一种冶炼业。此外，定居民、农民和手工匠役在游牧民中的存在是历史上的一种常见事实。

——草原居民在西伯利亚森林地区为获取毛皮而狩猎的猎人和生产纺织品与金属的定居民、喜马拉雅群山中的山地民、从中国西北（甘肃省）的一系列绿洲到河中地之间的定居商人、中东和东欧居民之间的居民所扮演的重要中间角色。

——以弱小部族对强盛部族的依附、畜群主与奴隶或农奴群体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一种部族社会。

——部落联盟和政治集团的不稳定性。我们应该指出，经选出的头人在他们之中的权力受到了骑马和全副武装的军人大会的限制。他们与定居民的交流接触和贸易关系成了经济和社会的借鉴与改造的缘起，而这一切在最早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加强政治组织并使草原社会富裕起来，但长此以往却由于部分部族或其贵族的定居化而引起了紧张关系和内部分裂。

喜马拉雅群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山人

山人的扩张发展区域延伸在近 400 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其

人口在 1957 年估计约为 300~400 万人。一种粮食农业 低产而又压饿的粮食 尤其是大麦、小米、黑麦、荞麦 有时还有在避风谷地生长的小麦 在那里与黄牛、牦牛、马匹、绵羊和山羊的饲养结合起来了。与草原地区的牧民之牧业相似的大饲养业在青藏大高原上也并非从未出现过，但冬天圈养和夏季进山放牧的山区牧业在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区占绝对优势。自然条件的多样性（高原、大山和谷地）解释了牧民或农民的专业化，或者是由同一批居民使牧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了。与石砌平顶（有时也呈数层塔状）的耕农住宅相对应的是牧民的黑帐篷。由于黠武好战之习俗，喜马拉雅山群山中的山民（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族人、嘉绒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对商队发动攻击并入侵定居农民的地区。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向东方即今之甘肃、四川和陕西诸省以及向北方的绿洲地区侵犯或涌入。

华南和东南亚的混合文化

这些今天正处于衰退中的文化过去曾大幅度地向长江流域和东南亚传播。它们把采摘业、狩猎、饲养业和不及在汉人中那样发达的农业形式、海岸和江河中的捕捞业结合了起来。它们面对平原水稻种植业的发展而向山区的退缩以及它们向南方的全面收缩使得让古老时代再现变得很困难了。为了能适应更加艰难的自然条件，某些集团被迫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转而接受一种流动农业的形式，这种农业形式从很古老的时代起就出现于东亚，但今天仍被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一大批少数民族采用，如广西、广东、贵州和云南的瑶族和苗族、越南北部的苗人和蒙（*Mhông*）族人、海南岛山区的黎族人……这种非常粗放的农业是借火烧灌木丛或森林而从事的刀耕火种，从而导致了村庄随着土地在 4~5 年之后的地力耗尽而迁徙。其农作物都是用掘地棍播种的根块作物

(芋头、山药)旱作粮食作物、山地稻和自几个世纪以来的玉米。这些古老居民中的一部分，特别是生活在海边和以捕捞为其主业的居民们都消失了，或者是与采纳了他们的海洋生产技术的那些从事发达农业的定居民们融合了。某些集团接受了水稻的种植术，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傣族、于 1957 年就普查到 780 万人口的壮族人、缅甸的掸族人、越南的泰族人(土人、黑泰与白泰人、侬人)中的情况即如此。他们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大江大河之三角洲上创建了一些组织严密的国家。这些居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对比较为人所熟悉，可以使人追踪他们自中越边界和中国中南部向更偏南方地区的迁徙(经伊洛瓦底江流域而来的缅族人、经湄南河流域迁来的傣人、自湄公河流域迁来的高棉人、自红河流域迁来的越南人)。

虽然历史的发展导致了水稻种植业从长江流域一直向爪哇发展，中国南方却以其古老的居民、语言和文化而与东南亚密切地联系起来。同一批藏—缅、傣、苗、瑶和孟—高棉少数民族也出现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山区。

这些具有千差万别文化的民族(我们通过文字史料和考古而熟悉了他们)的某些典型特征一直延存到我们今天，这就是流动农业、吊脚楼住宅、饲养水牛、酿制助消化和发酵的腌鱼、使用葵叶、运用背篓、使用口吹羽管琴(老挝的羽琴和中国的笙)、使用铜鼓、创造人类和洪水的神话 此外还有崇拜蛇、龙、犬、虎、萨满教……许多这类文化特点甚至在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半岛那些更为发达的民族中也非常广泛地传播。

西域绿洲的定居民和商贾的文化

中国有一系列连绵不断的绿洲，它们把甘肃西部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两端及帕米尔以远地区的锡尔河和阿姆河(希腊人所说的